

三率齐发抗通胀时机成熟

周子勋

中国人民银行3日发布《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增长速度和就业都处在合理水平,稳定物价和管好通胀预期是关键,也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要保持必要的调控力度,巩固和加强前期调控成果,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货币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出台。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各自发挥调控作用,共抗通胀。其中包括: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部分银行实施动态差别准备金率)、两次加息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近1.6%。毫无疑问,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当前物价上涨货币基础的作用。在目前通胀压力仍然相当大的情况下,三率齐发的局面或许会再一次出现。

作为吸收流动性的首选工具,存款

准备金率在经过了10次的上调之后,目前达到20.5%的新高度。以央行公布的3月份人民币存款余额计算,今年以来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冻结金融机构资金近1.5万亿元。但是在全球性的宽松货币环境下,市场流动性仍处于充足的状态。为了弥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市场流动性吸收的不足,央行辅之以公开市场操作来对冲日常的流动性。目前央行票据品种多为1年期、3个月期,正回购则为28天期和91天期。由于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短期产品,所以公开市场操作对流动性只能起到短期的调节作用,很难发挥到实质性的回收效果。数据显示,一季度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净投放现金为257亿元,可见,这一政策工具并未实质性收缩流动性,这一现实决定了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在回收流动性中的作用。在前期央行通过正回购等短期工具对到期资金进行对冲后,5月份公开市场到期资金总量已达到

5080亿元,加上4月份最后净投放的流动性以及外汇占款的资金,如此数量的新增流动性需要回收,可以预料,存款准备金率将再次上调。

抑制通胀是今年政府的首要任务,而要消除物价上涨的基础,利率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今年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为32个月以来新高,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亦上升了7.3%,为30个月以来最高位。依照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3.25%计算,负利率仍然高达1.75个百分点。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份曾表示,在国民经济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成功复苏后,通货膨胀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政策肯定会是一个重要工具。从整个利率情况来看,“负利率”直接侵蚀的就是居民的真实财富。在“负利率”情况下,居民储蓄不但无法获得收益,还将遭受损失。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会形成对房地产和股市等具有财富效应投资品的追逐。因此,笔者认为,央行加息不能仅仅是从对抗通胀压力这一目标出发,扭转“负利率”导致的资产价格泡沫及大范围的资源错配更应该成为其根本着眼点。

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局势的

动荡使得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地创下新高,使得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一直处于高位。而美日央行的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也使得我国的输入型压力倍增。随着输入型通胀压力的不断增加,汇率最近也开始在抗通胀方面被赋予新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此前发表文章表示,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稳健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减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今年一季度,我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债持有量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外贸顺差正在逐步退出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来源,其它因素成为外债快速增长新的重要来源。外汇局国际收支司长管涛也于日前撰文称,外债增速不降下来,将会极大地影响当前的物价和房价的调控工作。而降外债,汇率工具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

总之,在对抗通胀大前提下,实施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汇率三率齐发的时机正在成熟。

千城一面 乃权力意志的产物

唐黎明

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化都市”。这则旧闻因《人民日报》的引用再度引发热议。

急功近利的城市化大跃进,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地上演着集各种山寨建筑于一身的视觉灾难,最终导致千城一面。183个地级市不约而同地定下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雄心壮志,千城一面的视觉灾难,是巧合还是必然?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决策者主观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任领导一轮规划,每个领导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让城市面貌越来越现代化。因为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一个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很大程度上看其是否为城市做了怎样的政绩,尤其是表面视觉上的变化。于是,城市决策者都极力去做又快又光鲜的“表面文章”:别的城市有的,我也要有,而且要更大、更高、更长、更宽、更豪华;别的城市没有的,我也想有,不管那些东西是否适合这个城市。

于是,三十多年来,盲目跟风的开发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际大都市风、开发区风、广场风、草坪风、地铁风……一阵接着一阵刮,每到一次狂风,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就被磨平一次,并留下了许多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其中有许多成了垃圾工程和烂尾工程,成为这个城市身上的粉刺和伤疤。每个城市的特色正在消失,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的视觉灾难,各色山寨版的天安门、白宫、鸟巢……在神州大地上此起彼伏。

不仅是山寨建筑,山寨版的产业结构也横行于大小城市。如果说千城一面的城市建筑是视觉灾难的话,千城一业的城市产业结构,对一个城市的危害更加深远。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主要城市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0%以上。几乎所有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沿海城市都把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工程、新材料、金融保险等产

业作为首选发展目标,产业结构雷同化愈来愈严重。

从北京到大连、青岛等,都可以看到发展太一样,追求太一致,越来越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甚至很多城市都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精简版的北京。这种同质化的发展,忽视了城市之间的差异,抹杀了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真正的国际都市不在于规模和惊悚的建筑,而在于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在于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差异化战略。瑞士国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9万人,它的几个主要城市,规模小但具有独特的魅力,每个城市都具有鲜明的经济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仅45万人,却是欧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内瓦是瑞士钟表业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城市之一;巴塞尔只有20万人口,却有着享誉国际的化学、制药工业;洛桑人口仅14万,却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瑞士城市的发展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城市也要讲究专业化分工;只有经过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城市才能形成独特的竞争地位,别的地方才难以取代自己。

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帕白森先生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建筑界说: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中国城市真正原有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浅的、标准化概念的洪水所淹没。我确信,你们遭到了这种威胁。当城市建设成为可以彰显政绩的显学,就注定了千城一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广场、大建筑、大项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的价值认同。但是,千城一面的视觉灾难,毁灭的是城市的传统和文化,更会对城市的未来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警惕央企 借保障房再度布局楼市

吴睿钧

昨日,国资委通知要求央企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这是自去年国资委对78家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下达“退房令”后,首次明确要求央企争取多种途径参与地方保障房建设。

国资委鼓励央企主动参与保障房建设,无疑是值得称誉的公共政策,这不仅能破解保障房建设资金瓶颈问题,如期实现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顺利完工,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扭转弱势群体的住房梦想。

目前,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中,中冶科工、保利等都涉足保障房建设。从建设份额来看,央企在保障房的建设面积,已占到全国保障房销售面积的13%,显然,央企已日渐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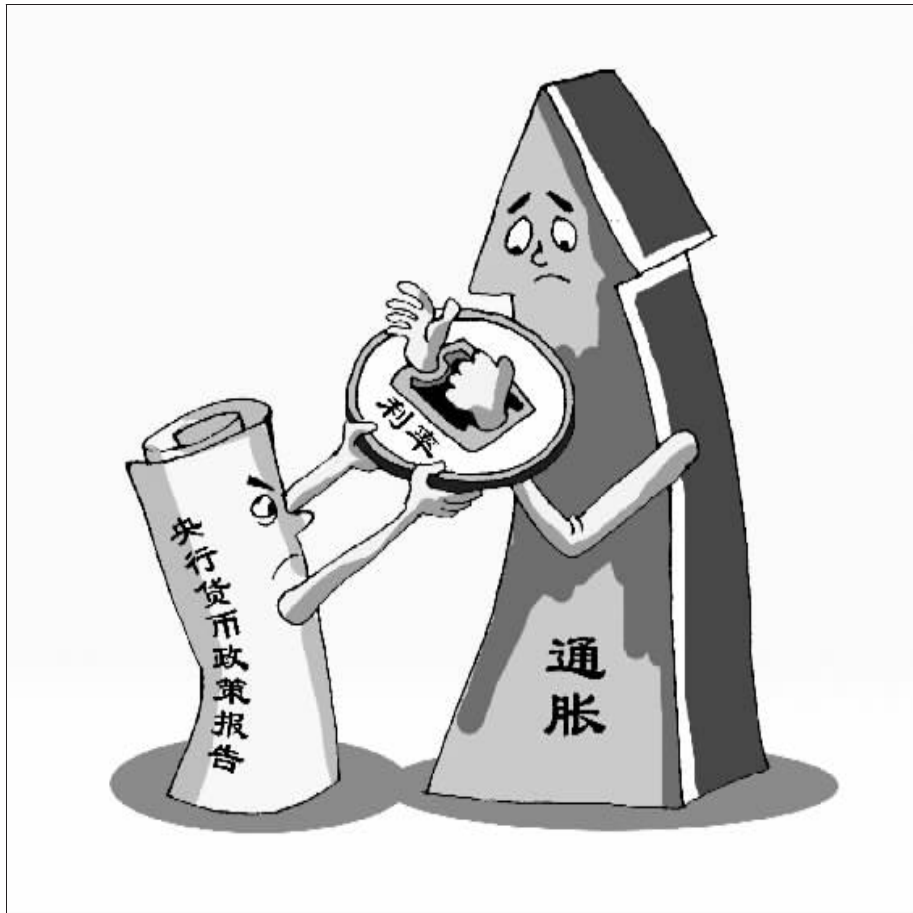
央企建设保障房,既是弥补市场缺陷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国有企业社会公益性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也能为央企重新赢得好名声。因为,近两年来央企凭借财大气粗,在全国各地“告地为王”,疯狂囤地,被舆论批评评为“不务正业”,进军保障房建设,会改变其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尽管这项政策得到社会的肯定,但令大家担心的是,在央企“退市”原本就异常困难的大背景下,如果央企大规模进军保障房建设,有可能成为其留在楼市的契机,甚至可能导致央企在楼市重新布局。

国家发改委于去年3月对央企“输血”房地产都重其事地发布了“请退令”。可是,一年零两个月过去了,据最新报道,227家央企所属三级以上房地产子公司中,转让出去的央企地产项目还不到30家,而获批准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央企却增添了5家新成员。这意味着,央企不情愿退出房地产市场,即使目前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出现量缩价不涨的困难局面,但是由于看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前景,多数央企集团对退出房地产业务采取的策略是“拖一拖,瞧一眼”,从而导致了这种“请退令”演变成“狼来了”的骗人笑话。

更让人不解的是,国资委此番《通知》在强化央企保障房责任的同时,并未表示要削弱其商品房业务。尽管国资委没有明确否定去年制定的非主业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的政策,但客观上却显然在努力使央企的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政策的模糊之处,也给了央企故意拖延以借口,也会让央企有可能在房地产市场重新布局,从而让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形变样。

众所周知,央企的一举一动,事关房地产调控全局,影响着房地产未来的走向。笔者认为,国资委在央企参与保障房建设政策上,除严格监督获准进入楼市的企业外,还应警惕和防止其他央企趁机投向房地产开发的“怀抱”,再度掀起“地王大战”,搅浑房地产市场。



央行日前出报告,股市率先吓一跳。收紧货币用双率,稳定物价靠宏观调控。转型前景有点悬,通胀预期不太妙。热钱只是替罪羊,货币超发应挨刀。

ICLONG/画 孙勇/诗

付之一笑 | Fu Jianli's Column |

肢体冲突频发:投机文化下的蛋



付建利

继前几年“中国巴菲特”但斌沸沸扬扬地传出遭巨亏客户“肢体接触”后,近日市场上又传闻明星私募基金经理江晖在投资者见面会上遭遇“肢体冲突”,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慨叹不已。

据笔者所知,不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在投资者见面会上这种场合,持有人或委托人对业绩不满而与受托机构人员之间发生言语冲突,甚至出言不逊的,早就屡见不鲜。此种现象,说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来自自负、自担风险的最基本原则,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部分投资者在出现投资亏损时“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尽管业绩不好基金经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出

手打人或者言语伤人,则明显超出了理性投资的轨道。

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公募基金持有人,更适用于私募基金持有人。无论市场如何,基金经理投资业绩坏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正常投资,没有出现老鼠仓或者明显懒惰等损害持有人利益的情况,持有人完全可以以脚投票,赎回了事,甚至可以一辈子不再购买其产品。出言不逊或出手打人,不仅显得持有人自身素质不高,也明显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甚至触犯了刑律,到最后持有人不仅投资亏损,还得到法律惩处。如果基金经理存在违规操作,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比如诉诸法律予以公正合理地解决。

每一位专业投资经理都有自身的投资风格,他们的风险收益偏好往往决定了在不同市场状况下的投资收益。以星石投资的江晖为例,曾经做过债券投资的江晖属于风险高度厌恶型,在具体的投资操作中,江晖也秉持了严格的绝对收益理念。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绝大多数公募和私募产品都出现了巨幅亏损,而江晖管理的私募产品由于重仓固定收益类产品,为客户带来了正收益,江晖因此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同,

以至于在一次投资者交流会上,客户主动集体起立向江晖鞠躬表示感谢。去年江晖因为看空后市,以至于业绩落后。投资老手都知道,一时看错很正常,股神都不可能每次都踩准市场的节拍,何况在A股这样波动性比较大的市场。客户完全可以要继续持有一段时间“以观后效”,要么自认倒霉,赎回自己购买的私募基金。当然,前提是江晖和他的星石投资一直在为客户勤勉尽责。在投资这一变幻莫测的领域,能力和态度是两码事,如果工作的态度一直很好,能力不行,这样的私募机构迟早会遭到优胜劣汰市场法则的抛弃。

如果细究一下“肢体冲突”传闻背后所透露出来的行业生态,更是让人感慨不已。私募基金市场一直存在这么一种怪圈:一旦某一时段某位私募基金业绩突出,立马媒体采访蜂拥而至,私募基金经理想不出名都难,而私募也往往借机大作宣传,趁机狂发产品,做大规模。一旦规模变大,超过一定额度,私募基金经理以往的投资手法就难以奏效,从私募业绩的历史循环来看,往往在上一年业绩好的私募基金经理,下一年业绩落后是大概率事件,以至于业内人士笑称“冠军轮流做,私募无大王”。而对持有人来说,购买产品时很多时候都不会仔

细分析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去主动考察私募基金经理的过往投资和业绩特点是否与自身风险偏好相符,单凭“谁的名气大我就买谁的”下决定,这种类似拍脑袋式的投资决策,一旦基金业绩与自己预期不相符合,客户就会出现情绪暴躁、甚至动手打人等非理性行为。

归根结底,投资者见面会出现肢体冲突这种现象,说明了我们的投资文化,仍然是以投机为主,如果持有人抱着平和的心态,在购买私募产品前多下点功夫,好好研究一下私募基金的投资特色,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如果私募基金秉持“业绩第一、回报客户”的原则,老老实实做好业绩,靠业绩来争取客户资源,摒弃投机取巧的营销伎俩,在客户购买私募产品时老老实实说清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做好客户摸底工作,给客户适当的回报预期,客户也不大可能出现情绪异常的情况。

小到一个私募机构,一个客户,大到整个证券市场,都需要健康的投资文化,投资文化才是决定一个市场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背后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虚”,但实践起来却很“实”,需要从多个细节做好。频发的肢体冲突的事件,正说明我们这个市场投资文化的成熟,值得市场参与各方认真反思,谋求良策。

行业最低工资约定 具有重大意义

陈东海

根据近日的报纸报道,4月23日,武汉市商贸烟草公会联合会与武汉餐饮业协会通过2个月的“马拉松式”的集体协商谈判,终于达成了《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约定该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为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今年员工工资涨幅不低于9%,全市近50万餐饮从业人员将从中受益。这也是迄今中国涉及从业人员最多的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开达成行业内最低工资必须高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的合同,相当于制订了行业的最低工资。这个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类比于产品内部控制标准,通常这些内控标准都高于国家标准甚至国际标准。所以,武汉餐饮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意义,不可小看,值得肯定。

最低工资在全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是新西兰,在1894年制订最低工资的制度,两年后澳大利亚跟进。其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中国大陆于1993年以《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开始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并于1994年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实行最低工资制度。

但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实行“实”而“虚”,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中的。一些理论认为,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有悖于劳动力市场工资自由确定的原则,会造成

无力支付最低工资的企业关门,导致失业增加。实践中,一些企业存在以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强制员工超时或无报酬加班的现象。这些现象,造成员工的应得工资水平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

这种以最低标准为基本工资水平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压低成本,大量地把员工作为“临时工”和“劳务派遣工”使用,并给于最低标准的待遇。

上述种种现象实际上严重违背了最低工资的本质属性。最低工资,第一是社会公平的需要,第二是保障劳动者最低程度养家糊口的需要,第三是最低劳动技能的工资水平。那些正常的企业,以最低工资水平作为员工正常工作强度和正常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不但违背了第一条和第二条的精神,也违背了第三条的要求。享受最低工资的人,应该是那些工作非常清闲、体力和脑力付出少、生产效率低的低技能劳动者,所以支付最低工资的应该是福利工厂之类的企业。

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直接惠及的是那些低技能、低付出、低产出的人群,正常付出的人群应该得到高于此的报酬。目前那些从事餐饮、制造等企业,对生产线上的农民工,或者是提供强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等,往往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正常的工资支付,这明显违背了最低工资精神,伤害了劳动者的权益。可以说,所有有尊严的企业,都不应该这样做,以体现企业和员工的荣誉和尊严,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武汉的餐饮业就开了一个好头,虽然这个标准也不高。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